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

主编 ◎ 达力扎布

明蒙关系 III —— 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美] 亨利·赛瑞斯 / 著

◎ 王苗苗 / 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I: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irs (1400–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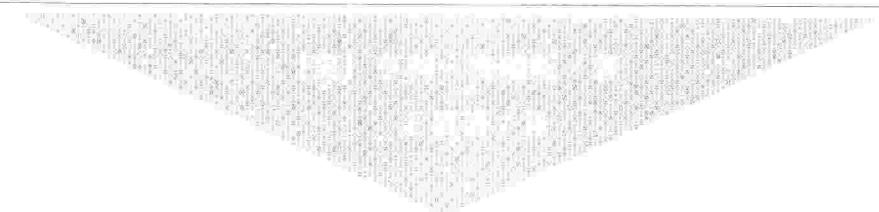
Henry Serruys

ISBN 978-7-81108-978-3

9 787811 089783 >

定价：42.00元

明蒙关系 III —— 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 [美]亨利·赛瑞斯著；王苗苗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6
(明蒙关系；3)

ISBN 978 - 7 - 81108 - 978 - 3

I. 贸… II. ①亨… ②王… III. ①马-边境贸易-贸易史-中国、蒙古-1400—1600 IV. ① F752.948
②F752.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5693 号

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 | |
|---------|---|
| 作 者 | [美]亨利·赛瑞斯 |
| 译 者 | 王苗苗 |
| 责任编辑 | 张 山 |
| 封面设计 | 布拉格 |
| 出版者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
| 发 行 者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印 刷 厂 |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16 印张：17.25 |
| 字 数 | 280 千字 |
| 印 数 | 1000 册 |
|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81108 - 978 - 3 |
| 定 价 | 4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前言

中国民族史及中国边疆地理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撤销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系、社会学系，三校的民族史、民族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汇集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部。1956年，又创建历史系，著名蒙古史和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担任系主任，分设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方向，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傅乐焕、王锺翰等著名学者在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全体师生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并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写。尔后部分教师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参加整理了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包括南海诸岛资料），并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由历史系和民族研究部人员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基本学术队伍，50多年以来，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论著，编辑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献资料。近年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等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史地研究学科被列入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建立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本中心的宗旨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在充分利用汉文史

2 || 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料基础上，鼓励发掘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史料和域外史料，注重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取得原创性成果。努力推出新人新作，培养中青年学者，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整理出版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史料，并进行研究，是本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将收入本中心整理研究的有关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的文献资料成果，通过出版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希望能给学术界带来一些新鲜的资料和使用的便利，促进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的深入。

在本系列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项目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学校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领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领导以及所有参与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达力扎布

2008年11月20日

译者前言

该书作者为美国著名汉学家亨利·赛瑞斯 (Henry Serruys)。事实上，目前国内关于 Serruys 的中文名存在四种译法：司律义、司律思、塞瑞斯、赛瑞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认为“司律义”的译法较为准确，因为蒙元史专家周清澍先生曾提及这是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 Serruys 在中国做传教士时为自己取的汉名，可惜现在已无具体资料证明这一点；《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一书的汉译者，在提及本书作者时采用了“司律思”的译法，但在其他地方未见相同译法；目前，已经汉译的十余篇 Serruys 的论文大多采用了塞瑞斯或赛瑞斯的译法，而其中又以赛瑞斯居多。因此，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便于学者参考，本书决定采用亨利·赛瑞斯的译法。

亨利·赛瑞斯出生在比利时，1935 年完成神学学业，第二年就被派往了中国当传教士。此后，他在中国传教的同时，认真学习和研究当地人民的语言和历史，很快便掌握了汉语和蒙语两种语言。1943 年他被关进日本集中营，后来被软禁在北平，直至 1945 年二战结束。1949 年，赛瑞斯开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东方学的研究。1954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居美国，继续之前的学习和研究。从 1972 年开始，赛瑞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从事牧师仪式活动，但一直坚持对中亚和蒙古历史的研究直到去世。

亨利·赛瑞斯对中亚和蒙古史的研究当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对明代蒙古历史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公认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根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明代蒙古史，他一生共出版了三部专著（明蒙关系研究三卷），十余篇论文，现将搜集到的列举如下：

三部论著分别是：《明蒙关系 I——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

2 || 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人》（The 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_WU Period），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已被汉译，分别发表在《蒙古学信息》、《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三辑）》和《西部蒙古论坛》（其中第二章和第六章内容为本人所译，故将之作为附录二、三，附于本书之后，以便查阅）；《明蒙关系Ⅱ——朝贡和使团（1400—1600）》（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 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I: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irs (1400—1600)），即本书，国内目前还没有人翻译过其中的章节。

主要论文如下：《明朝政府给予蒙古人的封地》、《明代的汉蒙贸易》、《板升》、《钟根——蒙古王妃的一种称号》、《16世纪初的蒙古部落及氏族名称》、《蒙古的“黄毛”和“红帽”》、《喀尔喀法规中的誓约》、《〈北虏风俗〉译序与注释》、《蒙古的医疗和占卜用的银杯》、《达延汗后裔谱系表》、《绥远麦达召喇嘛庙1606年汉文铭刻考释》、《16世纪末明朝北部的蒙古居住地》、《关于明蒙隆庆和议的四封文书》、《Ta-tu, Tai-tu, Dayidu》、《早期蒙古地区的喇嘛教》、《野乜克力部笺注》等十余篇文章，其中多数已被汉译，发表在《蒙古学资料与情报》、《蒙古学信息》、《卫拉特研究》等刊物上。

赛瑞斯精通包括汉语和蒙古语在内的多种语言，能够在研究中广泛、大量参考汉文和蒙古文文献。因此，这些论著和论文的水平普遍较高，对明代蒙古史及明蒙关系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本书是对刚刚提到的赛瑞斯明蒙关系研究三卷本之三——《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一书的汉译。在评价本书价值之前，首先需要就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做简单介绍。鉴于马市在明代蒙汉经济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国内很早就有学者关注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早在1938年，侯仁之就在《燕京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的文章，对嘉靖、隆庆年间宣大山西三镇马

市的建立及发展演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至 50、60 年代，秦佩珩、田静等学者也曾撰文专题论述明代马市。8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明代马市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涌现出专题研究明代马市及明蒙贸易关系的论文 40 余篇，从不同角度或总体论述，或分时段、分地域论述，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亨利·赛瑞斯《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一书出版于 1975 年，作为国外较早专题研究明蒙马市贸易的专著，该书引用史料丰富，研究深入具体，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并提出很多见解性较强的观点，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学术专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80 年代至今，国内关于明代马市、明蒙贸易研究的论文和论著中，竟未见有人引用甚至提及过该著作。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在这一研究领域做着不必要的重复工作。这应该是因为与西方国家学术交流的不到位造成的，目前在国内很难看到此书，我曾尝试在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国内各大图书馆检索该书，均未能查到。鉴于此，辗转自国外得到此书后，我深感有必要将之汉译，以供学界参考。

本书作者以时间为序，分地区论述了明代的马市以及马市之外的贸易情况，全书分为七章，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明代以前的情况。作者主要对明朝之前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情况进行了简单回顾，目的在于说明，这种贸易关系早在明朝之前就已存在，而明朝正式建立后自然应该继续维系下去。

第二章，马市之外的贸易。作者将明代蒙汉贸易分为两种：一种是朝贡使团在京城或者朝贡往返途中，与私人进行的形式多样的贸易；第二种是更为正式的马市贸易，如辽东马市、宣大马市。作者在这一章中主要对明初对外贸易的总体情况（包括明朝对蒙古、女真、朝鲜、中亚各国的贸易）、马匹交易情况、蒙古朝贡使团中的职业商人（回回商人）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马市之外的贸易（续）。作者详细论述了京城会同馆贸易的情况，并对嘉靖以前蒙汉双方的交易物品，包括农器、

耕牛、日常用品及违禁商品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关注了明朝不允许百姓与外族人私下交往和茶出现在蒙汉贸易中的情况。

第四章，辽东马市（1405—1618）。分别从辽东马市的设立时间、设置过程、市场数量、市期、交易商品、市场管理、马市中存在的冲突等方面，对辽东马市进行详细的梳理和论述。

第五章，宣大马市（1438—1552）。主要探讨正统、嘉靖年间宣大马市的设立过程和交易情况。

第六章，宣大马市（1570—1600）。约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对“隆庆和议”以后宣大马市的恢复、新市场的设立、明朝的马市政策、市期、交易商品、马匹交易数量、马市资金、市场规则和管理、款待和宴赏、马市的暂时关闭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七章，马价。主要探讨马价的构成、变化以及影响马价的各种因素。

除之前所言，我认为该书的价值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参考文献而言，本书不仅广泛参考汉文史料（达40余种），还全面借鉴美、日、俄、德、法等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明实录》中史料的深入挖掘和灵活运用；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对于某一历史进程或者文化现象，通常不做直接的理论上的论证，而是从经济角度进行基本的分析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第三，就思想性而言，作者于对比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在论述过程中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其中很多都是国内学者未曾关注或探讨过的。

当然，“金无足赤”，任何一部历史学著作都不可能超越其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本书也不例外：首先，囿于历史时代及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作者将明代蒙古与当时的中亚各国及朝鲜相提并论，错误地将蒙古当成了独立于中国的政权；第二，因为将《明实录》作为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所以作者对马市的论述截至万历末年。而事实上，明蒙马市贸易一直持续到清军入关，明朝灭亡。省略明末清初阶段的情况，使得这项研究显得不甚完整。

20世纪70年代，该书问世之初，美国学者孙任以都就曾撰文评论，为方便读者进一步了解该著作的学术价值，我已将该评论《评亨利·赛瑞斯〈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一文汉译并附于书后（见附录一）。

此外，为方便读者参阅，还有以下几点问题需要说明：第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作者所引汉籍史料还原，并结合相关版本对史料原文进行了认真核对。其中，作者参考的最主要史料《明实录》和《明实录抄》，分别根据作者本人所参考的版本（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明实录》和羽田亨、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料抄·蒙古篇》10卷、《明代满蒙史料抄·满洲篇》6卷）进行了逐一核对；第二，核对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几处地方作者标记有误，本书以译者注的方式进行了更正。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几经修改润色，力求做到“信、达、雅”，但毕竟年轻、积累有限，文中不妥之处，还敬请方家指正。

王苗苗

2010年11月10日于中央民族大学

前　　言

明蒙贸易关系研究与之前的明蒙朝贡体系研究，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因而应将两者共同进行讨论。事实上，这两项研究所依据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若单独研究贸易问题，又想论述充分，就必须对之前的某些论述进行一定量的重复。很遗憾，因为多方面原因，贸易关系一书的出版一再被耽搁。

正如我在朝贡体系研究一书中已经指出过的，大部分关于朝贡和贸易问题的史料都来源于《明实录》，且大都可以在由今人羽田亨和田村实造编辑的《明实录抄·蒙古篇》（十卷）和《明实录抄·满洲篇》（六卷）中找到。实际上，《明实录抄》几乎收录了《明实录》中所有与蒙古、女真相关的有价值的史料。最初，除非前往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我无法看到完整版的《明实录》。而后来，当我得到一套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校勘的《明实录》（1961—1966）时，本书稿已经完成。但为了给那些没有《明实录抄》的读者提供方便，我还是按照这一版本的《明实录》核对了所有引文。在核对过程中发现，只有极少数时候无法找到相对应内容：或者新版《明实录》中没有这条史料，或者将其列到了其他时间下。

蒙古的朝贡和贸易历史，对于现今蒙古地区的生活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必要性、可能性以及与中国保持战争或和平所造成的结果和影响。尽管15、16世纪时起作用的因素，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其早期相互作用的理解，仍然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当今问题。

为了研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需要在此列举一部我在完成本书很久以后才注意到的著作：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亚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72年）。通过题目就可以了解到，札奇斯钦先生的研究不仅局限于

2 || 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贸易问题，其论述涉及自秦汉至明清的全部历史。尽管有人曾对其中一些比较次要的结论提出过异议，但这仍然是一项显著的研究成果，在对某些观点的阐释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亨利·赛瑞斯 c. i. c. m

弗吉尼亚州 阿灵顿

Contents 目录

| | |
|----------------------------------|-------|
| 第一章 明朝之前 | (1) |
| 第二章 马市之外的贸易 | (6) |
| 第一节 贸易的总体情况 | (6) |
| 第二节 马匹 | (13) |
| 第三节 与蒙古的贸易 | (18) |
| 第四节 职业商人 | (28) |
| 第三章 马市之外的贸易 (续) | (33) |
| 第一节 会同馆贸易 | (33) |
| 第二节 农器、耕牛、日常用品等 | (38) |
| 第三节 限制和违禁商品 | (42) |
| 第四节 与外族人的非法交往 | (53) |
| 第五节 关于茶的记录 | (62) |
| 第四章 辽东马市 | (70) |
| 第一节 历史回顾 | (70) |
| 第二节 马市的数量 | (83) |
| 第三节 市期、交易商品、市场管理 | (95) |
| 第四节 马市管理 | (101) |
| 第五节 冲突 | (102) |
| 第五章 宣府、大同马市 (1438—1552) | (109) |
| 第六章 宣府、大同、山西、陕西马市 (1570—1600) | (122) |

2 || 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 | |
|---|--------------|
| 第一节 马市的设立..... | (122) |
| 第二节 新市场..... | (132) |
| 第三节 明朝马市政策..... | (141) |
| 第四节 马市的暂时关闭..... | (147) |
| 第五节 市期..... | (152) |
| 第六节 商品买卖..... | (156) |
| 第七节 马匹购买..... | (163) |
| 第八节 马市资金..... | (173) |
| 第九节 规则和管理..... | (183) |
| 第十节 安全措施：蒙古守卫兵..... | (194) |
| 第十一节 款待和宴赏..... | (198) |
| 第七章 马价..... | (200) |
| 参考文献..... | (212) |
| 附录一 评亨利·赛瑞斯《明蒙关系Ⅲ ——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 孙任以都 (222) |
| 附录二 元朝末年的一些情况 | 亨利·赛瑞斯 (225) |
| 附录三 明朝境内的蒙古团体——包括妇女和儿童 | 亨利·赛瑞斯 (248) |
| 后记..... | (260) |

第一章 明朝之前

关于明朝之前，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情况，我们了解不多。但作为研究明代蒙汉贸易关系的介绍，我们在此需要略举几例，与明代进行简单对比。隋唐时期，设立互市监，负责与突厥等民族互市交易马、驼、驴、牛。^①开皇十四年（594）“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突厥部落的这一请求得到了皇帝的允许。^②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古代传统一再强调朝贡的礼仪方面，但从一开始朝贡便是贸易的一种形式：因为进献到朝廷的贡品会得到丰厚的报偿，且每一个朝贡使团，除贡品外还会携带其他物品至中国贸易。然而，在中国市场上自由贸易，也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很多时候，中国禁止与北方和西北的部落进行任何交易。^③

在《隋书·裴矩传》中，我们了解到“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同一篇传记中，还记载了中国如何利用突厥对贸易的渴求来影响民族间的政治活动。例如，裴矩遣人告知突厥首领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于是，“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

① [唐] 魏征等：《隋书》卷 28《百官下》；[后晋] 刘昫：《旧唐书》卷 44《职官三》；[宋] 欧阳修：《唐书》卷 48《百官三》；Liu Mautsai, Die Chinesische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Tu-küe) (刘茂才：《东突厥史料》二卷，威斯巴登，1958 年)，第 454 页；Robet des Rotours. 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Armée. ([法] 罗都尔：《法译新唐书百官志与兵志》，第 459 页，第 475 页)

② [唐] 魏征等：《隋书》卷 84《北狄传》；刘茂才：《东突厥史料》二卷，第 56 页。

③ [唐] 魏征等：《隋书》卷 85《裴矩传》；刘茂才：《东突厥史料》二卷，第 454 页。